

会理古城的红色故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革命旧址、遗迹遗存和实物资料。其中，四川凉山会理，因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由滇入川，中央政治局在城郊召开“会理会议”而载入史册，同时也为会理的多元文化增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凭借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会理古城、会理会议纪念馆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些红色景点是中老年人重温激情岁月、感怀时代变迁的体验地，同时也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革命英雄的“打卡地”。

古城楼上硝烟起

会理古城，至今还保留有两座城楼。其中南门修缮一新的钟鼓楼又名“凌霄楼”，从2012年端午节开始，凌霄楼恢复了逝去近百年的晨钟报晓、暮鼓定更的传统仪式，营造古朴幽雅的小城氛围。而位于北门古朴厚重的城鼓楼又名“拱极楼”，外观看上去虽然简单粗犷，但其背后的故事却扣人心弦、跌宕起伏。

城鼓楼始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因北门内民房失火，烧及北门城楼而重建。重建的城楼高10余米，面积800余平方米，为明代会理城市交通和防御的重要设施，原先城楼上设有三门铸铁大炮，与四周的城墙构成了会理古代城市完整的防御体系。

1935年5月初，红军分三路抢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理城郊召开，红军主力休整，以红三军团围攻会理，牵制敌人，迫使城外敌兵撤进城内。

5月8日，红三军团到达会理城郊后，即按军委命令，担任前卫，迅速夺取城东的东山寺和城西南的西来寺制高点，包围了会理城。9日，干部团也到达会理城，投入围攻会理城的战斗。当时会理守城的是国民党军阀刘元璋，因提前得知红军要攻打会理城的消息，刘元璋下令用棉花浸透煤油引火，将城外北关、西关、东关的民房店铺全部烧毁，目的是清除制高点。民房一烧，人心惶恐，城里的有钱人纷纷逃往乡下避难。很快，守城士兵将四座城门关闭，并撬起街上的石板将城门封塞，不准百姓出入，强令军警死守。



图为饱经历史沧桑的会理钟鼓楼

5月9日，红军围城，战斗打响。红军攻城，主攻北、西两面。因南面是校场坝，地势开阔，东面有护城壕易守难攻，红军连续作战，迟迟攻不下城。

红军久攻不下城池，经数日连挖地道，5月14日，红军决定用火药炸城，可狡猾的国军已经察觉，并在城墙下灌水防止火药爆破。后来红军找来一口棺材，将火药装在棺材中，才将西北角城墙炸垮了一个三丈宽的缺口。城墙开口，红军趁势冲锋，双方机枪对射，最后大刀肉搏，四周用云梯爬墙，战斗异常激烈。后刘元璋率兵堵击，虽面部受伤，但很快堵住了缺口，红军攻城再次失利。

七天七夜的攻坚战，红三军团承受了重大伤亡，仍没有撼动会理城防。此时，会理会议已经顺利召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意识到，红军仅凭简陋武器，不宜进行城镇攻坚战，遂下令停止攻城，撤回会理。

草棚子下开会议

在会理城外的会理会议遗址，松林间的空地上摆放着几块石头，后人称其为红军石。1935年5月12日下午2点，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当时红军的领导人或坐在石头上，或站在附近，上方是临时搭建的草棚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会议开了一会儿，由于蒋介石的飞机不停地在天空中盘旋侦查，中革军委为保证会议的正常进行，避免受到敌机干扰，随后转移到铁厂村平安寺大殿内继续开会。

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 and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针对当时部队的情绪和离心主义思想，阐明了四渡赤水以来运动战战略思想的正确性，总结了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随后，与会领导人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全军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发了言，支持

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

会议还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充分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当开路先锋。

会理会议纪念碑的碑文是这样撰写的：“公元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千军万马由滇入川，革命烈火燎原红土，佯攻古城威震敌胆，会理会议永载史册。”

历史是这样评价会理会议的：“会理会议对巩固遵义会议成果，确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实现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胜利会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得民心者得天下

每一个城市，都有熟悉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活字典”。年过八旬的熊世鑫老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生于会理，长于会理，若要有人问

起他关于会理的人文史记，他抿口香茶就可娓娓道来。

据熊世鑫老人讲述，当年红军从会理过市虽然他尚未出世，但家中的四娘曾帮红军做过红五星帽，有一表兄还参加了红军。因此他自记事起，几乎每天都在听家人讲述红军当年在会理的故事，天长日久也就铭记在心了。

熊世鑫的四娘家住在会理城外的西草寺。1935年5月红军长征过会理时，景庄庙、杨家祠、草寺庙里都住满了红军。红军来之前，因国军四处散布红军要杀人放火的消息，城里多数人都逃往城外避难。

四娘初见红军时，红军都穿着破烂的灰军服，帽上钉有红布五角星，官兵都一样，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甚至有的还穿的火汗衫、偏襟衣服。别看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胡子都很长，但人很精神，对老百姓很客气，总是一张笑脸，称大家“老乡”“老表”“小兄弟”。

红军驻扎的地方都召集了群众去开会，红军告诉当地群众，红军是路过会理，是穷人的队伍，是专门打富济贫帮助百姓的。

红军还组织成立了穷人的贫民团，由贫民团带领大家去有钱人家搞斗争，没收大批粮食、布匹、洋纱、被子、衣服、铜器、瓷器和金银等物品。

当时凡住茅草房和破瓦房的群众都分到了粮食和生活用品，铜瓷器家具等都分给了帮助红军做事的穷人。在没收财物时，红军还捆走了几个长期欺压百姓的地主土豪。

四娘有一侄子叫卢凤熬，时年17岁，因常去杨家祠、草寺庙听红军讲革命道理，也亲眼见证了红军是一支帮贫困大众翻身做主人的好军队，于是和几个伙伴就地报名参加红军。遗憾的是之后再没有消息，家人多方打探，得到的却是他已经阵亡的噩耗。

熊世鑫老人说，其实大家都明白有革命就有流血牺牲，想想今天人们都过着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卢家人也因家有一位红军战士而深感自豪。当年红军虽然没有攻下会理城，但这支人民的军队却永远驻扎在了会理人民的心里。

(来源:学习强国)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



图为中共三大会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议。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宣言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

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表明党的二大宣言坚持了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

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与党的一大所通过的党纲相比，它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党的二大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党的二大第一次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不仅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古人是如何发现和接种疫苗的

为了防控疫情，我国已开始大规模的接种新冠疫苗。疫苗被称为隔离病毒的“防火墙”，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有了疫苗，能够有效地控制各种重大疾病。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疫苗接种法是西方最早发明出来的，其实，疫苗和疫苗接种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最早是我国发明的，并在治病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我国的许多古籍中，都有过我国古人发现和接种疫苗的记载。宋代发明了对抗天花病毒的“时苗”

天花疫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疫苗，是我国在北宋时期发明的，时称“痘苗”。我们的祖先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观察到有些患过传染病而康复的人，一般不再患同样的疾病，于是他们用物理方法(如捣碎、研磨)处理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制成最原始的疫苗。正是在这种“以毒攻毒”的思维方式指导下，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来对抗天花病毒的侵袭。

据清代医学家朱纯嘏在《痘疹

定论》中记载：“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惧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时有四川人清风，陈说：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百不失一。不逾月，神医到京。见王素，摩其顶曰：此子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说的是宋代丞相王旦，因苦于自己的孩子们均有出天花之疾，遂请峨眉山神医为其幼子王素种痘，王素种痘7日后发热，12日后结痂。这是见于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一次天花疫苗人痘接种获得成功的例子。

在清代官编医书《御纂医宗金鉴》中也提到，最早的天花疫苗接种方法，是利用天花患儿身上的痂或脓汁直接作为痘苗，吹到接种者的鼻孔内，使之感染天花病毒，出一次症状略轻的痘，从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接种法也叫作“人痘法”，跟后来的“牛痘法”有区别。作为痘苗的痂或脓汁，叫作“时苗”，跟后来的“熟苗”也不完全一样。

明代发明了更为安全的“熟苗”

“时苗”虽然有一定的疗效，但毒性也很大，“苗顺者十无一死，苗

凶者十只八存。”无法确保对被接种者全部有效，且风险较高。所以在明代隆庆年间，人们又发明了比“时苗”更为安全的“熟苗”接种之法。所谓“熟苗”，指的是以接种发出来的痘作为种苗，经过“养苗”“选炼”，连续种7代后火毒汰尽，再用来给健康的人接种，这样就非常安全了。

在隆庆年之前，明朝暴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天花瘟疫：“嘉靖甲午年春，痘毒流行，病死者什(十)之八九。”致死率竟然高达80%以上。正是这场天花的大流行，促成了熟苗接种法的推广。明代医生在大规模接种痘苗的过程中，通过正反方面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发明了“熟苗”接种法。1727年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解》中写道：“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由此蔓延天下……当日异传之家，今日尚留苗种，必须三金，方得一丹苗。”说的是宁国府太平县的一位医生，从神医世家得到了熟苗接种法，使这种接种法流传天下。这种提炼出来的熟苗“苗种”，

(来源:科普时报)

华蓓芳：

中国第一个制成氢气球的科学家

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展和欧美大致相似，即先有轻于空气的航空器——轻气球，然后是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并很快用于军事领域。

气球于1885年在中国出现。中法战争的时候，法国侵略者使用过气球。当时法国侵略军在战场上施放气球作为组织部队攻防的信号。随后中国人就开始了飞艇的设计和制造，但气球和飞艇在中国发展时间很短，很快就被飞机所取代。

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成立，当时除了聘用德国军事教官外，还聘用了许多中国科学家当老师，华蓓芳便是其中之一。华蓓芳是中国清末数学家，字若汀，江苏无锡人。1861年在安庆曾国藩军中佐理洋务新政，1865年在上海筹备设立江南制造局。1868年在制造局翻译馆任职，曾翻译多种西方书籍，其中有数学和其他科学书籍。1887年任天津武备学堂教习，后到武昌任两湖书院教员。1896年任常州龙城书院院长兼江阴南菁书院院长。

1887年，天津武备学堂购买了中法战争时法军在越南前线使用过的旧气球，学堂要求一个德国教习修复这个气球，作飞行表演，供学员实习。学堂的主管人希望这名德国教习能把气球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介绍给武备学堂的学员，这位德国教习却推三阻四。华蓓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刻带领工匠自制了一只直径约1.66米的气球，再自制氢气，充入球内，使它飞上天空。最后那位德国教习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向学员们讲授这门技术。

华蓓芳在天津武备学堂试制成功氢气球，不仅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而且这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自己制成的第一只氢气球，在近代中国航空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来源:中国航空工业史编修办公室)



中国男子羽毛球队首获汤姆斯杯

1982年5月21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2届国际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汤姆斯杯赛)决赛中，首次参加该项大赛的中国队以5比4战胜自1948年以来7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印度尼西亚队，第一次获得汤姆斯杯。中国男队8名参赛运动员是：韩健、栾劲、陈昌杰、孙志安、姚喜明、林江利、陈天龙、陈跃。栾劲击败了曾8次获得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印尼选手梁海量，为中国队捧回“汤姆斯杯”立下了头功。(来源:中国政府网)

